

# 人與非人： 人類世下後殖民主義研究的轉向

陳淑卿\*

作為重量級的當代批評論述，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和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sup>1</sup> 都關切與「人」相關的知識論、倫理和正義問題。「人」意何所指？誰才能算是「人」？「人」的邊界何在？「人」的論述產生背後的歷史是什麼？誰來為「人」發聲？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這兩個「後」學派（Post-）的論述起點都來自於對既成人文思潮的反省與挑戰，「後」（Post-）在這兩個語境裡指的不是超越或時間之後，而是反思與批判：後殖民主義挑戰以歐洲中心主義為本的現代性進程，以及背後的人文主義知識論與本體論對非歐洲他者的排拒；後人文主義則對人文主義所衍生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進行質疑與反省。這篇短文試圖在後人文思潮風起雲湧之際，重新省視後殖民主義的極限與可能的轉向與開展，追索這兩個思想流派對「人」與「非人」的概念建構，並透過兩者之間的論述交響與交鋒，來理解或想像未來的後殖民研究走向。

人文主義定義「人」為有意識的理知主體，具有自主性與能動性，理性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指導行動的主要工具，透過理性思辨可以追求真理和道德。對人文主義而言，人類的價值根植於內在，非來自外在權威或神祇，而是源於其自身的理性批判與反思能力。

但後結構思想家卻看出，這種本質式的「人」的概念其實是建構在一長串二元對立項下：自我／他人、男／女、主／客、中心／邊陲、本質／現象、理性／非理性、文明／野蠻、文化／自然等，這些對立項有嚴明的階層次第，左項恆高於右項，以左為主，以右為客。而所謂的本自俱足的理性主體，其實是建立

\*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sup>1</sup> 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泛指一個批判性、理論性的學術思潮，它反思並解構「人文主義」的假設，關注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身分的流動性等議題。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更多是一個描述性、前瞻性的概念，它指涉一個透過技術增強或演化，從而超越當前人類狀態的未來願景。但是，去掉連字號後，這兩個詞的英文拼寫完全一樣，因此在實際應用中，界線並不總是那麼清晰，甚至有時會互用。

在排除客體或他者之後顯現的假相，透過隱匿排除的過程，而達成主體嚴明的邊界性錯覺，使得人我之分顯得自然，這也產生各種社會與環境生態他者。

另一方面，誠如女性主義者和後殖民學者指出的，西方本體論預設的人其實是中產階級歐洲白種異性戀男人，只有他們才能獲得教育，具備人文主義的本體特質，如理性思辨能力，得以行使自主的能動性，具有話語能力、話語權、與批判力，也才配擁有人權、公民權和社會福利。歷來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思想家與後殖民國家建設，莫不以此基準作為政治行動的方略，試圖爭取性別、階級與種族弱勢的人權、公民權與社會福利，並積極為弱勢他者勾勒在各自特殊的社會情境下可以操作的能動性，讓被視為野蠻、邊緣、不文明的被殖民或弱勢他者重新獲得可認知與被認知的主體性與話語能力。但這種策略，卻弔詭的落入人文主義的二元對立知識霸權的窠臼，當我們試圖將弱勢他者納入以人為中心的現代性時空，將其教化為可說也可被說的政治主體時，那不可言說的本土知識與豐沛繁複的在地歷史往往被抹煞與消音。

這也是史碧娃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在她著名的文章〈底層人民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所提出的警示。在殖民語境下，「底層人民」的主體性不是一個可直接呈現的本質，而是被歷史、語言、權力結構所構造。這與人文主義相信的「普遍可自我表述的個體」相衝突。這些對西方話語與論述代理的批判背後其實也指向一個比較隱晦的事實，那就是底層民眾經驗本身的不可說 (unsayable)，那麼，什麼是他者難以被感知、理解與表達的經驗？這些經驗如何能以超越康德式的理知被接受與體會？在有關人的觀念上，我們如何跳脫二元對立，甚至正反合的辯證關係，重新定義主體？

早在上世紀九〇年代，加勒比海思想家格利桑 (Édouard Glissant) 就提出一個可以超越自我與他人二元對立的「他者」概念，在他的著作《關係詩學》(Poetics of Relation) 中，「他者」(the Other) 這個概念是他批判西方思想和構建一種全新、非階級化理解身分與文化方式的核心。格利桑對「他者」的運用超越了簡單的「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而進入一種更為複雜和流動的差異理解。在這個框架中，身分不是一個固定的、單一的「根」，而是一個動態的連接和互動系統。「他者」不再是必須被戰勝的對立面，而是「自我」擴展和演變的必要組成部分。值得玩味的是，格利桑的「關係」並非只適用於人與人之間，他在他的另一本書 *Tout-Monde* 所描繪的「世界全體」(Tout-Monde) 是一個由所有存在、所有元素共同編織而成的網，其中包含了人類、自然景觀、植物、動物、海洋、歷史記憶等等。格利桑強調，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不應是基於主宰，而應是基於共同存在。他以德勒茲和瓜達里的根莖 (rhizome) 意象來表達這種去中心

化的無限相遇與連結，並主張保留他者不透明的權利，拒絕殖民者要求完全可讀性。雖然格利桑的主要關注點是人文與政治，但他的思想架構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讓我們能夠將「他者」的概念延伸到非人世界。

格利桑的關係詩學倡導的非線性、無始源、根莖式的變動連結不僅跳脫二元對立的人我關係，也將關係網絡擴大到人與環境的連結，而挑戰了人類中心主義。但真正有意識地將後殖民主體問題放入當代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與氣候變遷的大脈絡下思考的，當屬印度裔歷史學家恰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後殖民研究和氣候變遷的挑戰〉(2012)“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2012)這篇論文中，恰克拉巴提主張，在人類世情境下，行星尺度的氣候變遷迫使我们超越傳統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觀(包括後殖民史學)，轉而思考一種足以同時納入行星尺度與多元文化差異尺度的多重史觀，在這個層次上，人類的能動性不僅由政治社會環境決定，也與地球系統緊密交織。他提出了雙重主體性(double subjectivity)的概念，認為當前世界面臨的環境浩劫早已超越了現代性霸權所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糾葛所帶來的危機。人類世觸發了不對稱的時間性，為了凸顯人類生存情境的複雜與多向，他提出將人同時放在人類歷史與地質歷史的雙重脈絡下，來討論他們的主體位置和倫理責任，人既是「身為人的人類」(the human-humans)，也同時是「非人的人類」(the nonhuman-humans)。人作為歷史、經濟、文化主體，有其多元與複雜的面向，他們活在全球(the globe)的時間向度，有權利追求生存權與公民權，但也須承受全球化與科技資本主義帶來的諸多不平等。人作為物種，是一個集體勢力的一分子，進入星球(the planet)的深度時間，須負起對地球環境與氣候變遷的責任，追求多物種的公平與正義(Chakrabarty, 2012: 11)。

恰克拉巴提所主張的雙重主體將人的定義複雜化與最大化，他未曾放棄人的政治能動性與社會責任，以及當代全球南方弱勢持續追求正義與權力的訴求，卻將人的歸屬格局提升至多尺度的歷史脈絡，將人的生命與星球和多物種連結，這也使得後殖民研究必須重新思考歷史範疇，以及後殖民學者的使命。在《行星世紀的歷史氣候》(*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 2021)這本書中，他進一步提示後殖民知識分子的觀念變革與新型任務。後殖民研究傳統上側重於現代性、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等以人為中心的敘事。人類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這些範疇，因為它揭示了人類歷史如今與深層地質時間和行星過程糾纏在一起。這意味著後殖民批評必須面對遠超人類範圍的時間尺度與行動者。後殖民史家必須學會：(一)同時運用「全球」(以人為中心，由資本主義、帝國和政治邊界塑造)以及「行星」(去人類中心化，以地球系統如氣候、生物圈、地質

為主)兩種視角。這兩種視角既批判全球不平等,又關切行星尺度的問題。(二)擴展「能動性」的概念:傳統的後殖民思想處理的是人類能動性,即反抗帝國、塑造文化的能力。在人類世中,能動性必須擴展到包括非人類力量——如碳循環、冰帽、微生物——這些力量如今也在積極塑造歷史。(三)重審「普遍性」:後殖民理論常常反對普遍性主張,因為它們在歷史上曾是殖民的工具。然而,氣候變化提出了一種共同的行星處境,這需要某種形式的普遍性論述。挑戰在於:如何在不抹去歷史與文化差異的情況下表述普遍性。(四)跨越行星危機與歷史不公之間的鴻溝:當今許多脆弱的國家在歷史上曾被剝削與邊緣化,須面對殖民遺產,才能應對氣候變化。後殖民知識分子必須在分析中將生態不穩定性與殖民剝奪聯繫起來。(五)新型團結模式:人類世的政治不僅要求跨越國家和文化邊界,還需跨越物種邊界,進行聯盟。後殖民學術必須以多物種正義和未來世代為思考對象,而不僅僅是歷史上被壓迫的人類群體。

恰克拉巴提的提案,使得後殖民的人的觀念朝向後人文/類思想開放,這帶來諸多觀念的變革:

其一、打破主體的邊界:主體不再是封閉,與自然對立的,隨著 Bradotti 橫向關係性 (transversal relationality) 與 Donna Haraway 共同生成 (becoming with) 概念的引入,後殖民想像的主體也隨之寬廣,人我的邊界不再清晰,人與物種的糾纏與共生關係,以及不斷流變的生存狀態成為主體的常態。

其次、重思能動性:人文主義能動性的定義也遭到挑戰,既然人的邊界不再是封閉的、本質性的,那麼,一些屬於跨主體的,流動於不同主體,可以增益共生關係的能動性就特別重要。理知、話語、意志等,不再是唯一定義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其他的人際特質如關懷、感性、體會、情動力、感官能力、跨身體物質交換等,也成為倫理行動的起點。而這種新型的能動性如何與後殖民理論關切的本土、原住民知識型結合,成為下一波研究的焦點。

其三、關注環境裡的殖民性:隨著關注的焦點擴大,後殖民學者意識到殖民性或殖民主義不僅限於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與資本強權對全球南方的壓迫,也深刻地改變了被殖民地的自然環境、生態系統和科技發展。後人類主義的跨物種、跨物質的視角,能幫助後殖民主義擴展其分析範圍,將環境剝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以及科技不平等納入論述。

恰克拉巴提提出的「雙重主體性」觀點,雖與後人文主義去中心化自由主義人類主體的努力高度契合,但後殖民理論與後人類學說之間依然存在明顯的分歧與張力。後殖民理論關注的是揭露並瓦解全球南方弱勢他者所處的次於人 (subhuman) 或去人性 (inhuman) 境況,並恢復其作為人的主體性;而後人類理

論則批評後殖民思維仍存有物種主義 (speciesism) 傾向，主張必須先揭示在人文主義構建「人類」過程中，其他物種如何被野獸化 (beastification) 並淪為人類中心主義的他者，才能真正避免在人文主義驕慢中「解放」後殖民弱勢他者 (Islam, 2016, 120)。

後殖民學者桑柏 (Juanita Sundberg) 則批評後人類理論的主要論述來自西方學界，往往忽視原住民知識體系，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嫌疑 (Sundberg, 2013, 33)。恰克拉巴提亦提醒，不應將具體的歷史不義簡化為單一、抽象的行星性敘事，否則後人文主義的普世化語言可能在無意間抹去殖民歷史的痕跡。

因此，恰克拉巴提的「行星性」轉向，一方面拓展了後殖民批評的視野，使其能同時兼顧全球與行星、人類與多於人類的關懷；另一方面，也對後殖民理論與後人文主義提出挑戰——兩者必須在承擔集體人類責任的同時，維護歷史脈絡與差異的不可抹煞性。

## 參考文獻

- Bra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akrabarty, Dipesh. (2021). *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 Chicago: Chicago UP.
- Chakrabarty, Dipesh. (2012).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43(1) (Winter 2012): 1-18.
- Glissant, Édouard. (2010).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 Betsy Wing. Ann Arbor: The U of Michigan P.
- Haraway, Donna J.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raway, Donna J.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NC: Duke UP.
- Islam, Monirul. (2016). Posthumanism: Through the Postcolonial Lens. In *Critical Posthumanism and Planetary Futures*, Ed. Debashish Banerji and Makarand R. Paranjape, Springer, 116-129.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271-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undberg, Juanita. (2013). Decolonizing posthumanist geographies. *Cultural Geographies*, 2(1): 33-47.